

“三·一八惨案”与北京女师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肖梅 高湛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是 1908 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9 年才改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924 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31 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经常来到女高师，向学生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号召学生们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对她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时，女高师学生们在强大的革命浪潮推动下，打破了学校对她们的封建专制束缚，冲出学校(当时女高师规定学生不准同外界接触)，高举“打倒帝国主义!”“严惩卖国贼!”的标语，汇入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中。这是中国女子第一次结队上街游行，在我国妇女解放斗争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妇女开始打破两千年的精神枷锁，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就是女高师的同学做出的。

“五四”运动以后，经过大革命风雨的洗礼，女高师学生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她们对当时的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改变这个社会自己应负的责任，树立起为摧毁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而奋斗的决心。她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办起了号召自由和解放的刊物《北京女高师半月刊》。这些进步的女学生和女知识分子，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1926 年 3 月 18 日，北京人民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干涉内政，谴责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在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执政府门前，军警向请愿队伍开枪射击，打死 47 人，重伤二百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曾参加过这一请愿活动的、今年已 84 岁的李沐英老人(她是 1925 年 9 月从湖南岳阳来京考入女师大的)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3 月 17 日这天，我和一个叫彭援华的同学正在一个俄文专科学校旁听，突然传来了英、美、日等八国公使已向段祺瑞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停止天津、大沽间的军事行动，撤除一切防御的无理要求，并限 48 小时答复的消息，我们非常愤怒，跑出课堂，加入了全市大、中学校代表到执政府请愿的队伍。在执政府门前，我们同卫兵交涉，要求面见段祺瑞，卫兵们凶狠地阻拦我们。人们高喊‘让我们进去，我们要见段祺瑞!’一个卫兵二话没说，举起上着刺刀的枪就向前面一个男同学刺去，血呼地从那个同学的身上涌出来。请愿的群众代表被军警们驱散了。”第二天北京各界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李大钊，赵世炎等出席了大会，并做了讲演。会上，

一个代表报告了昨天在执政府前请愿的经过。那个被刺同学的血衣高挂在主席台上，与会者情绪高昂，高喊着口号。会后，人们由天安门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李大钊同志扛着一面大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女师大的请愿队伍是由学全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带领的。李沐英老人说：“那天刘和珍正在患感冒，不时呕吐，但她没有把病放在心上，很早就起来了，通知各班同学做好集会、请愿的准备。出发前，她做了简短有力的思想动员。出发后，她又一直领导和组织女师大的队伍。那时铁狮子胡同执政府东西两侧是铁门，进到铁门里后，才是执政府的大门。请愿队伍站在铁门内的大院里，我们女师大的队伍挤到了前面。执政府门前好几排荷枪实弹的军警面对着请愿群众，气氛很紧张。大家要求见段祺瑞，门卫传话说段执政不在。人们愤怒地喊着：‘非见不可！’‘打倒卖国贼！’口号声震天。突然，军警向请愿队伍开枪了。人们朝铁门外涌。在拥挤中，人们摔倒了，人压人成了‘人山’。我也被挤倒了，我被压得一动也不能动，只听到子弹嗖嗖地飞，眼见着中弹的同胞倒在血泊中。这时，执政府卫队的军警有的拿枪，有的拿刀，有的拿着棍棒一齐大打出手，向赤手空拳的群众乱砍乱杀。一些男同学不顾个人危险把我们这些被挤倒的人一个个往外拽。我被拉出来后，在对面街上找到了自己的同学。这时，一阵枪声响了起来。我们贴着路旁的房子跑，一个铺面主人悄悄打开门，朝我们说：‘快进来，趴在地上。’这样，我们才幸免于难。”

女师大学生在这次惨案中牺牲的有刘和珍、杨德群两位同学，受伤的有十名同学。刘和珍是第一阵枪响时在执政府门前中弹的，杨德群前去扶她，也被打中。同学们得知刘、杨二同学牺牲了，可是遗体还没有收回来，既悲愤又焦急。李沐英自告奋勇去收回这两个同学的遗体。当天晚上，她和程毅志等三个同学租了一辆汽车到执政府要求收尸，遭到阻拦。那些卫兵端着枪恶狠狠地说：“你们再敢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一齐来，大锅熬。”她们连夜托人交涉，费尽周折，第二天才收回了刘和珍的遗体。李沐英老人流着眼泪说：“我和刘和珍虽然不是一个班的，她比我高两个年级，可我对她印象很好。她待人热情，脸上总带着笑，很善于做学生的发动工作。那天，我们去执政府前的院子里收她的遗体时，天下着雪，白白的雪花掩盖了她的遗体。当时刘和珍已经血肉模糊看不出面容了，从她的衣袋里翻出名片后，才确认是她。我亲手为刘和珍给擦洗遗体，发现她全身有多处子弹和刺刀的伤口，真是惨不忍睹。”

3月25日，女师大召开追悼刘、杨二烈士大会，全校师生和许多与烈士并不相识的朋友共千余人参加。庄严的礼堂，供满了鲜花，挂满了素联。两个闪着光辉的黑漆灵柩静静地安放在一起。灵前，并列着二烈士生前的遗容和殉难后的照片。灵前右边的一个玻璃柜里摆放着血衣、血裤、血鞋——这是刘和珍烈士生

前穿着的最后一套衣服。追悼会上，许多女同学泣不成声，她们是跟着生气勃勃的和珍出校，归来时却同她作了永别。她们痛哭前线倒毙的勇士，她们痛哭战争中失去了首领。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女师大师生向刘、杨二烈士敬献挽词，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当时的日文《北京周报》上有这样的记述：“在这个混乱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女学生之刚健。凡是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这个情形支那是一定会兴隆的。”中国女子历来受的压迫更大而且更久，因此她们对于革命的要求和决心是更加强烈、更加坚定的。女子的觉醒程度标志着全民族的觉悟程度。这一点连当时的日本记者也不能不承认。鲁迅先生于1926年4月1日写了《纪念刘和珍君》这篇著名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以刘和珍为代表的女师大进步学生，就是这种“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中国妇女的先锋。从“五四”运动到“三·一八”惨案，女师大同学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引导下，把自身的解放、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民族的兴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她们站在时代的洪流中，与恶势力抗战，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行动。她们的行动是对几千年封建旧礼教的勇敢挑战。

（作者肖梅、高湛，原刊于《高教战线》，1985年第3期，有删减。）